

书 品

(2008年第2辑)

徐俊 主编

中华书局

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若干“谬误”

——兼记胡适最后一次在杭州

● 散 木

胡颂平编著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，是“胡适学”中相当重要的一本书，庶几也是晚近学术史或学人谈屑的一本极有价值的书，此书在大陆的出版，先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年的一个版本，作序者是耿云志先生；近有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的一个版本，“序”替换为毛子水 1983 年所作，“毛序”且视此书与德国爱克尔曼记录的《歌德谈话录》相似，可分别见出东西两位文化巨子“老年时的智慧”，此洵为的论。

要说两个版本的不同，是前者按原版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4 年版）原样移入，是谓“为保持原书风格，未作技术处理”；后者则“仅对少数不适的话语作了删节”，即进行了一些“技术处理”，但“整体基本保持原貌”。其实，以笔者的愚见，似大可不必，不过这可能也反映出两书出版时不同的“出版生态”吧，虽说后者仍“整体基本保持原貌”，只是对于一些年轻的读者，可能会有一些“阅读障碍”。

此话且不提。再说两书都有编者和记录者，亦即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的“后记”，胡颂平的话说得很诚恳，他最后说：“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谬误，以便改正。”当然，如果说有“谬误”，那也不一定是他的误记，即可能也有胡适自己的“误说”，笔者就发现少许，以下试为“改正”一二。

—

如书中提及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之祖之一姜立夫先生，即：姜

立夫原妻吴氏在他们成婚不久即病逝，后来姜立夫与中国现代科学史上著名的“三胡”（胡敦复、胡刚复、胡明复）的妹妹胡芷华结为连理，胡适于是又想起当年“中研院”的诸位院士，如竺可桢等，但不知怎的，竟把竺可桢后来的夫人误记为姜立夫的妹妹了（新星版第245页）。

竺可桢原来的夫人是张侠魂，他与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是一对连襟，即邵妻就是国民党女元老张默君。张侠魂夫人在浙江大学抗战时的“文军长征”——西迁中，因颠沛流离而患病，无药可救，牺牲于路途中，后来竺可桢续弦，夫人则是陈源（西滢）的妹妹陈汲。张默君、陈汲，都不是姜立夫先生的妹妹。

胡适回忆的错误，可能是因为姜立夫也是浙江人（温州人。中国近代以来的一部数学史，离不开温州人），而且姜立夫也曾考取“庚款”留美，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，因此不免与竺可桢相混。

胡适在谈话中提及竺可桢，有意思的是在沧桑鼎革之际。即当年胡适飞离北大之后，1948年10月13日，胡适又离开南京，先后在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进行演讲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陆的高校演讲了。

1948年10月19日，胡适到了杭州，当时他住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。第一天，他参观了钱塘江大桥、游览了六和塔和西湖之后，随即来到浙江大学。在与竺可桢校长夫妇、郑晓沧、潘企莘等老友会面后，第二天，胡适又游览了西湖边孤山的“林社”（即纪念求是书院创始人林启的团体和景点），并且看了高啸桐先生的遗像；下午，胡适遂在浙大进行演讲，题目是“自由主义”。胡适应竺可桢邀请，此次在浙江大学讲演，当时正是“中央研究院”的院士选举之后，全国各地有许多学校纷纷邀请院士去做学术演讲，胡适就是在武汉大学演讲之后先到上海、再赴杭州的，而胡适在浙江大学演讲的题目，另有一说是《自由的来源》（此次演讲的文稿，笔者遍寻无着，至为可惜）。胡适讲演完毕，他就经上海回到北平去了。此事见之于阮毅成的《适庐随笔》（刊台湾《小世界》第401期，1972年9

月),阮毅成还在另一篇文章《任鸿隽与中国公学复校》(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第26卷第3期,1975年3月)中回忆说胡适是10月18日到杭州的,那么,胡适这次来杭州,一共用时三天。

胡适回到北平,不禁在日记中感慨道:“此次出外三十六天,真有沧桑之感。局势一坏至此!”³⁶天,是胡适于9月16日离开北平赴南京出席“中央研究院”成立22周年纪念会暨第一届院士会议,会后在两位老朋友即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、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盛情邀请下赴武汉、杭州讲演并游玩,至22日返回北平,不料期间沧桑鼎革,已是大局迁变,这段时间居然成了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时间,而当时胡适与他的两位老朋友周鲠生、竺可桢的思想,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胡适在浙大的讲演《自由的来源》,未见文字,不同于胡适秘书胡颂平在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(第6册)的记载,胡明在《胡适传论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)中则记为《自由主义与中国》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时期胡适在各地有许多关于“自由”以及“自由主义”的讲演和文章,估计其内容会大致相仿。如就在他来杭州之前,他已发表有《自由主义是什么》(《周论》第2卷第4期,1948年8月)、《自由主义》(在北平广播电台的讲演,1948年9月4日)、《自由与进步》(在南京的讲演,1948年9月27日)、《自由主义与中国》(在武汉大学的讲演,1948年10月5日),显然,很可能他在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讲演会是相同的。此后,胡适去了台湾,“下车伊始”,他又做了《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》的讲演(1949年3月27日)。当然了,所以都以“自由”以及“自由主义”为题,是针对当时的形势,胡适感到去日无多,不得不说了。

胡适晚年还有一个回忆,他说:“胜利之后(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。笔者注),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,竺可桢是浙大的校长,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。你想,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,他的一切都被学生监视住,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。”(胡颂平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)。胡适当时还回忆起了一个细节:当年竺可桢住的楼

下，有一株松树。笔者查索《竺可桢日记》，1938年3月16日，竺可桢忆及战前，记有：“昔在杭州大学路浙大校长官舍前有二罗汉松，一高大而一低小。”可知胡适所言不虚。

胡适、竺可桢，这两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、教育、科学的巨子，他们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——少年时的同窗、同舟留学美国的友人、在中国提倡和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弄潮儿，再到主持风会、影响广被的思想家和教育家，他们有同声相求的一面，也有不谐和的一面。这是后话。

二

胡适晚年的谈话，不小心说错了“党参”。

胡适说：“古代所谓参，是指陕西的党参。”（新星版第121页）不对。

胡适晚年因心脏病多次住院治疗，当时医生的药方和友人赠送的“长生方”中也多有参这种补药。参，种类繁多，如苦参、拳参、丹参、参三七、高丽参、人参、党参、西洋参、孩儿参、太子参、明党参、玄参、沙参等，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多是“万基”和“康富来”等等的西洋参，广告语云：“古有诸葛亮轻摇羽扇，帷幄之中决胜千里，今有康富来洋参含片，令您神采飞扬。”如何？吃还是不吃？当年胡适却不相信，他说：“有人说西洋参可以强心，没有这么一回事。古代的所谓参，是指陕西的党参。你知道西洋参是什么？那是在纽约附近是用来喂猪的。西洋人以为用这种东西来喂猪，猪会长得特别肥，后来发现中国人把它当药吃，才推销到中国来。”原来如此！当然，胡适的话不可当真，否则假如你节日里割肉般掏钱送丈母娘的西洋参原来是喂猪的，这岂不是绝妙的“黑色幽默”？公道地说：洋参，确有“消除疲劳，恢复体力，强身健体”的功效，至于是不是“拥有康富来，健康财富滚滚来”之类，那是你常识的判别，你信，就信呗；不信，人家也有自由。胡适不信有他的自由，也有他的道理。至于胡适说“古代所谓参是指陕西的党参”，则是错了。

“党”，地名之上党，即今之山西长治，晚近历史有所谓“上党大捷”，此前常燕生先生的《山西少年歌》中，也有一句“泽潞论兵一代雄，飞狐上党掩天空”，那是说唐代藩将的故事。党参，就是指出自上党的参，因此地山多灌木，气候也宜参的生长，所以党参有了名气，原先向来是进贡的贡品。上党，夙有几件宝物：党参、草帽辫、堆花以及“三潞”之潞麻、潞绸、潞酒，党参入药，因其性平、味甘，功能则补中益气。

三

胡适晚年谈话，提及历史学家夏曾佑，他说：“他的儿子夏元璠，当过北大理学院院长。”（新星版第 57 页）夏元璠，应是夏元 。

夏曾佑、夏元 父子，一个搞历史，一个搞物理。其实杭州夏氏家族原来就有从事科学的历史，夏元 的祖父夏鸾翔即清季有名的畴人（数学家），夏元 则是在少年时读书“求是书院”（即今之浙江大学的前身）时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的。后来他又读书上海南洋公学，乃至留学美国、德国、英国（师从物理学大师卢瑟福），后应父辈的严复校长之请，赴北大任理科学长兼物理学教授。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，文科学长为陈独秀，理科学长也是夏元 。后来夏元 又在柏林大学师从普朗克、爱因斯坦，且成为在中国最早讲授相对论和理论物理的一名科学家，1922 年由他翻译的爱因斯坦《相对论浅释》（商务印书馆版）是中国第一本相对论的译著，影响远及整个亚洲。

四

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（第 169 页）还提及冯友兰。

胡适平素就对冯没有好感，其原因是冯的治学致思与庙堂过于贴近，这在抗日战争时就是如此。所以，胡适晚年闲聊时说起大陆的学人，他说：“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，李仲揆（四光）也病了。”又谈到陈寅恪、姜立夫，忽然又提到：“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，知

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。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。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。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。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，冰箱里都装满东西，带到大陆去做买卖，预备大赚一笔的。他平时留起长胡子，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。”“此外，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、沈从文、华罗庚等人，听说过得非常苦。”

这是不严谨的话。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《铁箫人语》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）一书中所说：“1948年父亲从美国回来，带回一个电冰箱，当时是清华园中唯一的，大概北京城也不多。知道校医院需要，立即捐出。”两者比对，显然，应该是1948年3月时冯友兰从美国夏威夷归国，随身带回一个电冰箱，至于胡适所说冯于1950年从檀香山带回三个电冰箱，一定是时间上的误记，因为1950年中美关系已经中断，冯友兰已在国内，他已没有可能去美国了；此外，当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的电冰箱，也并非三个。

胡适所以对冯友兰有上述的“闲话”，是从“伦理意图”而带出的，因此，他对冯友兰从美国带冰箱的主观动机的推断，就是“大胆设想”的产物了。这些议论，在胡适此书中还有一些，不过，因为是“谈话录”，姑妄听之可也，我们也不必当真，权当是胡适先生在“侃大山”吧。

（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，
胡颂平编著，新星出版社
2006年10月，25元）

默室求深，备其宣导

——读陈桥驿教授新著《水经注校证》

● 辛德勇

北魏酈道元撰著的《水经注》，是一部对历史地理学者充满诱惑的典籍。这种诱惑，首先是缘于它内容丰富，记载了北魏以前大量地理事实，而且还都清楚地记述有各项地理要素与附近河流的相对位置关系。但是，假若果真都是一清二楚的记述，反而又不会吸引研究者驻足，因为这样一来，就不再有什么能够挑战研究者的智力。《水经注》的巨大魅力，乃在于它是由酈道元荟萃众多著述编缀而成，而这些著述来源不一，地理位置和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复又参差不齐，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问题，需要仔细考辨分析；另一方面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，这部书又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文字舛误，并且佚失一部分篇章。由于地理典籍的特殊性，往往一字之差，真的就会谬以千里，从而愈加增重了利用这一典籍的困难，同时便也增大了对研究者的诱惑。

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《水经注》版本，文字舛错就已经相当严重，特别是存有许多《水经》经文原本与酈道元注文相互混淆的问题。万历时人朱谋 刊刻《水经注笺》，开启了学人校勘此书的先声。清代中期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三位学者，又相继做出了重要校勘，尤以赵一清耗费心血最多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《水经注》一书展现出全新的面貌，逐渐接近其固有形态，学者阅读，不再存在严重困扰，可是却依然遗留有很多问题，需要进一步研究。到清朝末年，则有杨守敬、熊会贞师弟撰述《水经注疏》，并绘制《水经注图》，今人誉之为一代集大成之作。

杨守敬和熊会贞合著的《水经注疏》，前人评价一直很高，可是在今天看来，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。从历史地理研究角度来看，杨、熊二人所做疏证，总的来说还很缺乏学术深度，他们的学术贡献，更多地是体现为移录相关文献，笺疏史事，与旧时文人笺注诗文，性质大体相近。这样的工作，对深入研究《水经注》的地理问题，固然极为重要，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基础，并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，但毕竟还没有能够深入地解决这些地理问题。学术研究需要世代相承，谁也不能一蹴而就，杨守敬和熊会贞二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著述，成就已经相当卓越，接下来的工作应是当代学者要来承担的职责。不过，若想进一步解决这些复杂的地理问题，首先还是要更为全面细致地做好《水经注》文本的校勘工作。

在这一方面，杨、熊两人虽然也做了不少精湛的工作，但总的来说，他们显然更侧重于内容的疏释，而不是文字的校勘。与杨守敬约略同时，王先谦撰述有《合校水经注》一书，属于纯粹的校勘性质，但王氏此书，一如其所著《汉书补注》、《后汉书集解》等，只是汇聚罗列前人成说，自己基本上不做裁断；虽然便利他人，却没有新的见识。

民国时期，有两位著名学者，对校勘《水经注》给予了很大关注。一位是胡适先生，很早就注意搜集《水经注》的版本，为校勘积累材料；另一位是王国维先生，曾校录很多重要版本于一书，准备下一步勘定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定本，这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排印出版的《水经注校》。遗憾的是胡适后来过多卷入政治，晚年复漂泊异国，心境落寞，以致终生没有能够从事这样的校勘，只是花费很多精神，为他的乡前辈戴震大大地做了一番并不成功的辨白，试图洗刷戴震剽窃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的品行污点；王静安先生则在壮年绝意尘世，一切旧业宿愿，皆以不了了之。于是，只好由后来学人承其馀绪，继续逐一勘比较对。

陈桥驿先生籍隶浙江绍兴，就省籍而言，正是王静安先生的同乡后辈。陈先生自少年时起，就喜读《水经注》，从事历史地理学研

究以后,更专注于研治此书,已经出版有一系列专门著述,其中仅《水经注研究》文集就有四集,另外还有专门考订阐释《水经注》具体文字记述的《邠学札记》。除了自己的研究之外,陈桥驿先生还积极倡导建立“邠学”,作为专门研究《水经注》的学科,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响应,早已枝繁叶茂,蔚为大观。

在“邠学”研究的学科构想当中,版本校勘,一直是陈桥驿先生极为关注的基础问题,经过几十年持续积累,近年也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。

在陈桥驿先生过去出版的《水经注》校勘著述当中,最为重要的有两种。一种是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、熊合著《水经注疏》,是与段熙仲先生合作完成。另一种是1999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水经注校释》。前书如上所述,性质已经与邠道元原书有很大差别,所以,主要不是校订《水经注》的文字问题。后者是陈桥驿先生多年来校读各种版本所积累的成果,陈先生自己讲述说,这是他在“邠学”研究中花费力量最多、耗费时间最长的一项成果,汇聚海内外不同藏本33种于一书,并且还参据了其他大量相关文献,堪称《水经注》版本校勘史上的空前盛举。不过,出版这部《水经注校释》,却并非完全出自陈桥驿先生的意愿,因为当时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校勘尚没有最终完成,在很大程度上,这一次是碍于杭州大学老校长多年交谊的情面,不得不提前付印。

这部早产的《水经注校释》出版之后,陈桥驿先生一直继续从事《水经注》的校勘,增添很多新的内容,最终完成《水经注校证》一书,交由中华书局于2007年7月出版。陈桥驿先生自己总结说,这是在他的《水经注》校勘经历当中工作量最大、校注内容最为繁复的版本,也是他有生之年内所能完成的最后一部《水经注》校勘。可以想见,这部《水经注校证》,应该说是陈桥驿先生数十年来持续校勘此书的最终定本,它也堪称清代中期以来众多学者勘比《水经注》文字的集大成著述。

按照陈桥驿先生所做的说明,这部《水经注校证》一如此前出

版的《水经注校释》，采用《四部丛刊》影印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作为底本，在《水经注校释》已有校勘的基础上，本书主要增加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（1）吸收《胡适手稿》的相关校勘成果。（2）录入陈先生自著《邠学札记》中的考订内容。（3）采录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的校勘成果。（4）列入其他现代学者零散研究成果，如岑仲勉《水经注卷一笺校》、陈先生自著《水经沮水篇笺释》等。具体的校勘工作，虽然主要是列举注本文字异同，但也有很多阐释性注释，特别是从所撰《邠学札记》书中移录过来的内容，多属研究性注释，凝聚了陈桥驿先生几十年的研究心血。

这些阐释性注释与文字勘比性校记之间的关系，略似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的释文与所附《水经注笺刊误》的关系，两大类内容的性质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；而两书外在形式上的不同之处，在于赵一清是把《水经注笺刊误》别出为一种单独的著述，附在《水经注释》之后，陈桥驿先生则是将其散入相关文字之下。陈桥驿先生如此处理，虽然使这些阐释性校注文字在版面上略显臃肿累赘，但却更便于读者在使用《水经注》的时候随时参阅。这两种处理方式互有利弊，因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判别。

除了汇聚众多版本、精心勘比异同之外，这部《水经注校证》，较诸前人研究，还有一个重要贡献，就是征引大量相关历史文献，进行文字对比，并辑录到众多《水经注》传世文本早已不见的佚文。这些都是陈桥驿先生多年潜心读书、日积月累的结果，其有助于《水经注》的深入研究利用，功德尤深。

深入研究《水经注》这样的古代地理文献，特别是解决其中的疑难地理问题，当然需要结合相关的地理知识。但是，有很多人鄙夷文献研究，大肆鼓吹说，闭门读书早已过时落伍，只有走出书斋，通过实地考察来疏释《水经注》的记载，才是具有当今时代水平的《水经注》研究，这样的主张和行为却不一定有益。依我看，时下通行的这种所谓考察，大多只是很简单地到各地浏览一番山川形势以及有关文物古迹，而且这些人也很少有人真正受到过地理学学

科知识的系统训练,走马观花,看不出和满天下东西游荡的旅游者有多大本质区别,这些人究竟能够考察到什么,本身就十分值得怀疑;况且科学发展到今天,地理知识的获得,早已不仅局限于自己亲身察看观测,从书本上间接获得的知识常常会更为准确,更为丰富,获取这些知识也更为迅捷,不一定非像当年的徐弘祖一样到处乱跑不可。即使那些确实需要考察的疑难问题(不是简单地将古文改写成白话就能大功告成的内容),大多也首先需要在室内充分解读《水经注》的记载,明确问题所在、考察的着眼点所在、才能够发现有价值的地理信息。要想做好这样的工作,就必须耐得住寂寞,肯坐冷板凳,关起门来在故纸堆中细心搜讨,借用一个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序言中讲过的词,就是“默室求深”。

陈桥驿先生本来是地理学专业科班出身,多年来也一直积极倡导采用野外考察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,并且结合实地考察得出过一些有关《水经注》的新见解;同时,又基于对文献校勘研究基础性地位的认识,倾注数十年之心力潜心校勘《水经注》的文本,精益求精,老而弥笃,终于成此煌煌巨著,正可谓“默室求深”的结晶之作。

这部《水经注校证》最重要的学术贡献,是为进一步研究有关《水经注》的各项问题提供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文本资料库。陈桥驿先生的校勘工作,备列文字异同,但却有意控制尽量不做正误是非的勘定。在这一点上,它与清末王先谦《合校水经注》颇有相似之处,而陈先生所勘比的内容,则远远胜过王氏旧作。因此,在嘉惠学人利用《水经注》这一点上,其学术功德也大大超过了王著。过去学者使用《水经注》,是以王氏《合校水经注》最为通用,而长久以来没有新的印本,我很期盼能有出版社重新影印王氏合校本的原刻本,却一直没有能够见到。而今有了陈桥驿先生这部《水经注校证》,足以取代王氏旧本,作为阅读和研究利用《水经注》的首选文本。

陈桥驿先生贡献给我们的这部《水经注校证》,必将以其丰富

的校勘资料，大大推进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，同样借用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序的话来讲，就是足以“备其宣导”。在这些后续研究当中，首先要做的工作，应该是结合具体研究，进一步考辨确定《水经注》的文字。当然，这常常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事情，容易造成主观的失误，但我们校勘《水经注》的基本目标，应该就是尽可能恢复酈道元原书的本来面目，在不同的异文之间，终究还是要努力做出判断。

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，都是蒙陈桥驿先生主持审查通过，借用过去科举时代的说法，先生乃是我的座师。先生后来也给我很多奖掖提携，恩重情深。很多年以前，在读硕士学位期间，导师史念海先生还特地聘请陈桥驿先生从杭州来到西安，为我和同学们做关于《水经注》的专题连续讲座，后来还利用各种机会当面向先生请教过许多问题。而今先生年事已高，面见请益，有诸多不便，因而，我想在下面，利用先生《水经注校证》提供的基本资料，尝试对酈道元《水经注》自序的文字妄自做一点考订，权且充作阅读先生这一总结性校勘著作的开篇第一份读书报告，向先生汇报我的学习心得。考订的形式，是分段逐一写录《水经注校证》点定的酈道元自序原文，有需要考订提出判断的地方，便在这一词句下面划出横线，然后，在原文下面先列出陈桥驿先生的《校证》文字，再附缀我的考订。

■ 《序》曰：《易》稱天以一生水，故氣微于北方，而爲物之先也。

【校证】(1) 盧文弨撰《群書拾補》，言曾在武進臧氏得絳雲樓宋本見此序；趙一清《水經注釋》，卷首從孫潛夫過錄柳大中抄本錄入此序。今此序共四百八十四字，盧文弨所見宋本爲四百八十一字，趙一清所收僅二百五十六字。胡適《鐵琴銅劍樓瞿氏藏明抄本水經注》(《手稿》第四集上冊)：“瞿本有酈道元自序，中間缺了半頁二百二十字。”若按《大典》本四百八十四字計，則瞿本僅存二百六十

一字。(2)《序》曰，盧本及趙本均無此二字。

【考订】(1)瞿本存酈序字数，《校证》疑有笔误。盖酈氏自序《永乐大典》本之四百八十四字，减去瞿本所缺二百二十字，瞿本应剩存二百六十四字，而不是先生所说“二百六十一”字。(2)清代中期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《水经注》通行以后，在几种著名文章选本或是总集中收录有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序文，其中包括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(卷一一)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(卷二一上)、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(《全后魏文》卷四一)等，诸书文字与《永乐大典》本和殿本都有一些差异，或是出自不同来源，或是虽出自殿本而复做有改订，也可以用作校勘的参考。又陈桥驿先生与段熙仲先生合作点校的《水经注疏》，卷首附列酈道元原序，并做有校记，据此书卷首陈先生撰《排印〈水经注疏〉的说明》，知这些校记系由段熙仲先生执笔，所做点校基本上亦是出于段氏之手，陈桥驿先生仅署名“复校”，故与此《校证》本每有出入，也可用作参据。(3)“《序》曰”二字，除卢文弨《群书拾补》录臧镛堂校本及赵一清过录孙潜夫从柳大中处抄本未有外，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、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收录此序，亦俱缺。案古人作序，无此用例，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所载此序明确注明系出自聚珍版本《水经注》，而却弃而未取“序曰”二字，就应当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殿本酈道元序文录自《永乐大典》，《大典》系首尾一字未遗地整篇收录《水经注》全书于八贿韵“水”字下，故于起首处书作：“《水经》，桑钦撰，酈道元注。序曰：《易》称天以一生水……”审此写录形式可知，“序曰”二字，应属《大典》纂集者出于其特定形式需要所添加，不会是酈书固有的内容，而臧氏校本录自宋版原书，自然无此二字。故此处“《序》曰”二字当删。此亦戴震校勘殿本《水经注》多事掠略而未尝如赵一清之精勤经营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。

■《玄中記》曰：天下之多者水也，浮天載地，高下無所不至，萬

物無所不潤。及其氣流屈石，精薄膚寸，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，神莫與並矣。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冲，而盡其鴻深也。

【校证】“靈宇”之“宇”，孫潛夫從柳大中抄本作“寓”。

【考订】案作“寓”字者不惟孫潛夫抄本，殿本所依据的《永乐大典》本亦书作“寓”。段熙仲《水经注疏》校记谓《大典》本作“宇”，乃误说。又段熙仲云“宇、寓一也”，似亦不确。“寓”在此非“屋宇”之义，应是用作动词，作“居处”义解，以与上文“泽合”之“合”相照应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径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辨牛马。于是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”疑邴氏“不崇朝而泽合灵寓，神莫与并矣”，即由此化出。“泽合”，指秋水横溢，黄河变幻为“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”的浩瀚大泽；“灵寓”，指黄河水神河伯欣然居处于大水之中；“神莫与并矣”，是讲河伯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”而其他神灵不得与焉的自得心态。殿本作“宇”字或为校勘者从《永乐大典》传录时以“宇”、“寓”音义相近致讹，应从《大典》原本改作“寓”字为宜。

■昔《大禹記》著山海，周而不備；《地理志》其所錄，簡而不周；《尚書》、《本紀》與《職方》俱畧；都賦所述，裁不宣意；《水經》雖粗綴津緒，又闕傍通。所謂各言其志，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。

【校证】《大禹記》之“記”，盧本作“經”。

【考订】案盧本作“經”字，尚有说明云：“《大典》作‘記’，今从臧本。”卢文弨校本系取臧镛堂本与《永乐大典》本对校之后，“择其善者从之”，故知卢氏本做有斟酌抉择。今案这段内容中“山海”应当是指《山海经》，它与下文《地理志》亦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尚书》亦即《尚书·禹贡》、《本纪》亦即《禹本纪》、《职方》亦即《周礼·职方》，同为秦汉以前最著名的地理文献（“都赋”指班固《两都赋》之类京都赋）。刘向《上〈山海经〉表》谓当禹平治水土、定高山大川之时，“益与伯翳主

驱禽兽、命山川、类草木、别水土”，“禹别九州，任土作贡，而益等类物善恶，著《山海经》”。因益佐夏禹著为此书，故亦可谓大禹作《山海经》。所以，此处应从卢文弼，作“經”字，读作“昔大禹經著《山海》”。

■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，而涉土遊方者，寡能達其津照，縱髣髴前聞，不能不猶深屏營也。

【校证】“訪蹟”之“蹟”，盧本作“蹟”。

【考订】卢文弼本作“蹟”字，尚有说明云：“大典作‘蹟’，余疑是‘蹟’字，今见臧本果然。”又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并作“蹟”。案“蹟”字义胜，应据改。

■余少無尋山之趣，長違問津之性，識絕深經，道淪要博，進無訪一知二之機，退無觀隅三反之慧。獨學無聞，古人傷其孤陋；捐喪辭書，達士嗟其面墻。默室求深，閉舟問遠，故亦難矣。

【校证】三反，盧本作“反三”。盧云：“當由習讀《論語》者改之。今從臧本，對上‘訪一知二’校正。”

【考订】覆按卢文弼《群书拾补》原文，其“對上‘訪一知二’校正”之“校正”，本作“较整”。又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并同卢氏校本，作“反三”。对应上文，当从卢校互乙作“反三”。

■然毫管闕天，歷筭時昭，飲河酌海，從性斯畢。竊以多暇，空傾歲月，輒述《水經》，布廣前文。

【校证】輒述，盧本作“輒注”。

【考订】卢文弼本作“輒注”，复有说明云：“《大典》作‘述’，今从臧本。”段熙仲校《水经注疏》谓“据下文‘布广前文’，作‘注’是。”案

似可依从卢校改作“注”，然作“述”亦通。

■《大傳》曰：大川相間，小川相屬，東歸于海。脈其枝流之吐納，診其沿路之所躔，訪瀆搜渠，緝而綴之。《經》有繆誤者，考以附正文所不載；非經水常源者，不在記注之限。

【考訂】“《經》有繆誤者，考以附正文所不載；非經水常源者，不在記注之限”，此句段熙仲先生斷作：“經有繆誤者，考以附正。文所不載，非《經》水常源者，不在記注之限。”前此影印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水經注》時亦作如此斷句，文義較勝，應從。惟“經有繆誤者”之“經”字似亦以添注書名號稍佳。

■但繇古芒昧，華戎代襲，郭邑空傾，川流戕改，殊名異目，世乃不同，川渠隱顯，書圖自負，或亂流而攝詭號，或直絕而生通稱，枉渚交奇，洄湍決瀆，躔絡枝煩，條貫系夥。

【校證】自負，盧校云：“疑是‘貿’字。”《註疏》本段熙仲《校記》云：“全本作‘貿’。”按段氏誤，全氏《五校》抄本此序從趙本，不及“書圖自負”句，《七校》本作“書圖自負”。

【考訂】段熙仲《校記》復有按語云：“按作‘貿’于義為長。”孫星衍《續古文苑》、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、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俱作“貿”。案“貿”字在此作混雜、雜亂解，符合上下文義，作“負”字則不通，應從盧校改作“貿”。

■《十二經》通，尚或難言，輕流細漾，固難辯究。正可自獻逕見之心，備陳輿圖之說，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

【校證】《十二經》，《註疏》本段熙仲校不作書名。但按《莊子·天道》：“於是繙十二經以說。”故《十二經》之名在酈氏時代早已流